

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贺捷生



贺捷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十九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的行动,从九、十月份就开始准备了。我母亲蹇任正怀着我临产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敌人会用百倍的疯狂来报复,苏区将面临一场浩劫。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询问我母亲的消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生。十一月一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队长长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极为高兴。刚好前线打了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的胡须扎醒了,可能那时候的我,把他的爱当做对我的侵犯,哇哇地大哭起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天天盼着听你这小毛毛的哭声呢!这一下可好了!你哭出来了!哭出来了!好啦!”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得的一场胜利,父亲、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

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为了戎马倥偬的母亲。部队长征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还是忍痛割舍?父亲把他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走得很远,要越过千山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走,留给你抚养,好吧?”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接。父亲着急了,亲自去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走了。父亲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他是怕我们连累他。”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么亲近的亲戚都躲起来了,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多辛苦了。”这时候,我正在哭,母亲把我抱起来说:“别哭了,再辛苦我也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多远!无论……”

当时,部队为了长征,进行了

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起来,路上遇到合适的人家再送人吧。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的新生女儿生离。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上摇晃,涌起的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指挥部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我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随着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我四处找奶。我的哭声把老乡们都引来,老乡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无数位奶妈给我过奶水。爸爸妈妈说我吃过多奶妈,这是名副其实的千家奶啊!

那时怪不怪?父母和任弼时、萧克、王震、卢冬生、贺炳炎、贺彪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对我的哭泣不仅不厌烦,反而都愿意听。一旦我不哭了,他们反倒担心。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喝不睁眼,

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和蛋清搅成泥糊抹在我的肚脐上。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不哭的我又哭起来,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才舒心地笑了。

父母盼我哭,可有时他们又怕我哭。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军。母亲很紧张,紧紧地用奶头堵住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得没气了,仔细一看,我在母亲胸前的布里酣睡呢。

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父亲把我放进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里。他骑马冲过敌人封锁线后,却把我丢了,我的哭声让红军战士们发现了,他们见我用军衣包着,猜想是红军的孩子,就抱着我行军,后来,辗转把我送到父母手里。但这个故事父母都不承认,都说没把我丢过,而贺炳炎却一口咬定是真的。我想,这故事可能是真的,父母不想承认是觉得我这娃儿一出生就历经了世人都难以经受的磨难,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得太多吧!

过雪山时,母亲背着我,当她千辛万苦翻过雪山之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也激动得哭,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雪山没夺走你!我的命大啊!在那次,我十五岁的舅舅蹇先超就牺牲在寒冷的雪山上。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把干粮分给了丢了干粮的女战士马忆湘(当时她才十二三岁),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哇哇直哭。一个警卫员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面粉,搅成糊糊,抹在我的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地止住。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由于行走在红四方面军的后面,野菜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许多人因为吃了

不知名的野菜都中了毒。为此,父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母亲就把试吃过的野菜捣成菜泥喂我。野菜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一次次吐出来,母亲就一次次再喂。

长征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只好带着走。看来我是因祸得福呀!如果我是个健康健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宿营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避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我没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天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她,她到底是个女孩。”

也许真的是我命大,几天后,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给了全军一个惊奇。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新中国成立,许多叔叔阿姨都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都愿听到我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安,就是欣慰啊!就怕听不到你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还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力气,就对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不如猫的叫唤声呢。”当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瓷缸炖羊肉汤喂我。慢慢地,我能站起来了。

一九五〇年,我在重庆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十四岁的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就是你的哭声……”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条路哭,也是我的生命之歌。

一九三一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带着学生到庐山写生,归来途经南昌,当地的报纸报道了徐悲鸿的行踪,许多人慕名而来,多数是向徐悲鸿请教的青年美术爱好者。

画家傅抱石正失业在家,处境非常困苦。他得知徐悲鸿来到南昌,忙带上自己的作品到旅馆去拜访。当他到达旅馆时,发现里面座无虚席。傅抱石只好心情忐忑地等待。

轮到傅抱石时,他走进深深地鞠了一躬。徐悲鸿仔细打量眼前这位瘦弱的青年。他大约三十多岁,穿一件旧长衫,腋下夹着个小包袱,面对徐悲鸿很是有些拘谨不安。徐悲鸿请他坐下。他没坐,打开包袱,拿出几块图章和几张画。徐悲鸿看了图章的拓片,发现刻得很好,细看边款署名却是“赵之谦”。徐悲鸿纳闷了,说:“这些图章……”傅抱石喃喃地回答:“是我仿的。为了生活,我仿赵之谦的图章卖。”徐悲鸿说:“你完全不必模仿。你自己刻得很好嘛!”傅抱石没有再说什么。徐悲鸿又看了他的画,顿觉眼前一亮。画面上峰峦密布,画幅不大却气势恢弘,一股灵气扑面而来,徐悲鸿赞赏不已。

他问傅抱石:“你现在做什么事?”傅抱石回答:“在小学里替别人代课。”傅抱石没有进过学校,少年时候当学徒,学习做伞,后来就在小学当老师。但是做代课老师也没有多久,就再次失业在家了。

“这也是从家附近的书店看来的,那家旧书店里有很多斜书图刻簿谱,我就站在那里看。时间一长,店家和我熟了,看到我用工功,还让我去他们的书库看书。我读的书都是从那里看的。”

徐悲鸿眼眶微微湿润了。他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孜孜学画,从香烟画片搜集动物画片来临摹,在中华书局门市部、审美书店看美术书的岁月。眼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和自己当初何其相似了,看到我用功,还让我去他们的书库看书。我读的书都是从那里看的。”

傅抱石推了出去,躲进了床边的大柜子。这个柜子本来存放傅抱石的书画,而今书画被搬出来了,正好空着。

傅抱石把冒雨来访的徐悲鸿接了进来。他请徐悲鸿坐下,奉上茶,就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徐悲鸿也没喝茶,直接说:“傅先生,看看你的画吧。”他走到窗边的桌子前,开始看画,连连称好。看完画,徐悲鸿说:“你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傅抱石像在梦中,更不知说什么好了。徐悲鸿接着说:“经费困难,我给你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你愿意到法国去吗?”

傅抱石兴奋无比,高声告诉妻子:“见到了,我见到他了。”贤惠的妻子罗时惠迎了出来,不由得也高兴起来。傅抱石让妻子把家里的画都找出来,说:“徐悲鸿大师要看。”他挑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张,卷在一起,包在包袱里。好不容易待到吃了晚饭,傅抱石带着十几幅山水作品来到旅馆。不巧徐悲鸿被几个老朋友拉走了。门房留下话,让傅抱石将画留下,留下地址,有空再叙。傅抱石放下画,怅然而归。

第二天一早天下起雨来。傅抱石坐在门口,望着门外浙沥的小雨思绪飘飞,心烦意乱。他想知道徐悲鸿大师对他的画的想法,他甚至想以此来断定自己选了美术这条路究竟对不对。他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得生计奔波,跟一个修伞匠当学徒,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仅仅凭着自己的爱好,他练习刻字,一直练到可以在一块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刻出整篇《兰亭序》。后来,他又学治印,学画画。他对画画如此热心,打算后半生付给丹青。但是,这条路能够走得通吗?南昌,虽然出过大画家八大山人,但是傅抱石却没有找到能够指点迷津的导师。好不容易,名画家徐悲鸿来南昌,机会难得,自己能够把握吗?登门求教的人那么多,徐悲鸿大师会注意到自己吗?傅抱石胡思乱想,等待命运的裁判。

雨,依旧下着,傅抱石忽然听到巷口有人说话,而且提到自己的名字。他站起来走出去一看,惊奇地叫了起来:“来了!来了!大师来了!”说着回头叫妻子罗时惠。罗时惠非常慌乱,把昨夜精心整理好的傅抱石的画作搬到房中间仅有一张桌子上,她心里很紧张:“我穿成这样,怎么好见徐悲鸿

大师。”傅抱石很抱歉地看着妻子,罗时惠身上还是出嫁时穿过的蓝布衫,已经洗旧发白还擦上了补丁。“快出去迎接,我回避一下。”罗时惠把傅抱石推了出去,躲进了床边的大柜子。这个柜子本来存放傅抱石的书画,而今书画被搬出来了,正好空着。

傅抱石把冒雨来访的徐悲鸿接了进来。他请徐悲鸿坐下,奉上茶,就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徐悲鸿也没喝茶,直接说:“傅先生,看看你的画吧。”他走到窗边的桌子前,开始看画,连连称好。看完画,徐悲鸿说:“你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傅抱石像在梦中,更不知说什么好了。徐悲鸿接着说:“经费困难,我给你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你愿意到法国去吗?”

徐悲鸿慧眼识傅抱石

蒋华强

古装历史大戏《大风歌》在央视八套播出时,观众为对历史的严谨把握和语言上的准确精美而称道。

中国历史,在电视荧屏上,已被演绎了许多。所谓“四大盛世”,此前已有三大盛世被人写过,隋时开皇盛世,唐时贞观盛世,清时康熙盛世,只汉朝“文景盛世”不曾荧屏上再现。为什么?不好写。

《大风歌》,恰是将最不好写的“文景盛世”写出。历史上的“四大盛世”终于年在《大风歌》播出之际,统统再现荧屏。

《大风歌》编剧李硕儒与湖南女作家张伟佳,就是瞅准了这段因为难写而始终无人问津的历史。用两年时间,从刘邦建汉始,至汉文帝去世终,前后五十年,写成一部大型史诗般电视剧——《大风歌》。

李硕儒——这个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出版界是很响亮的。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他与很多著名作家如王朝柱、叶辛、张抗抗、王安忆、白桦等相知相熟,往来频繁。作家们信任他,他们为他出书。

一九九八年,李硕儒移居美国,与他分离多年的妻子儿女团聚。远离祖国和众多文友墨客,他不再“为他人做嫁衣”,却欣然加入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开始为华文报刊撰写专栏。多年积累和矢志不渝的爱好,令他放不下文学,旅美数年仍与在国内一样,始终笔耕不辍。

如今,作为美籍华人,旅美作家的李硕儒,已著有《浮尘岁月》、《彼岸回眸》、《寂寞绿卡》等多部散文随笔集面世。熟知李硕儒的人说他是“一个年年都有进步的人”。

二〇〇三年,当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李硕儒再度回国小住时,他忽然感觉,一切似乎都变得陌生了。这期间,他参与了昔日好友王朝柱、李准、仲呈祥、杨伟光、洪寿

祥等在北京香山的一个会议,是关于中国历史剧的。他听得极认真。与会者说,现在拍历史剧的很多,但是太烂,特别是戏说成分太重,还有打着正剧名号胡编滥造的。现在的中国孩子也包括一些成年人,读书的越来越少,看电视剧的越来越多,如果老看这种胡说八道的电视剧,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岂不都要被毁于戏说了?与会者还提议,写写十大有作为的皇帝,或十大有作为的文化名人。会后,李硕儒心里始终沉甸甸的,但当时他还不曾想过自己朝一日也会写历史剧来。

一次,他与湖南女作家张伟佳聊天,说起了关于历史剧的问题,说起了那个让他感觉心里沉甸甸的会。张伟佳忽然兴致勃勃地说了句:“咱俩写吧。”李硕儒一愣,尽管他已经写过不少散文、小说、评论、随笔之类,但对写历史剧却没有多少信心。见他犹豫,张伟佳鼓动说:“可以查资料啊。”李硕儒还是犹豫:“我没那么多时间,书读得又慢。”张伟佳信心十足地回应:“我找。我重点找资料,你来写。”

回到湖南,张伟佳真的动起来,她读书快,做事又麻利爽快,没多久就整理了很多资料给李硕儒传过来。李硕儒能从中看到它的故事。李硕儒在电话里鼓励她,很好,你继续找资料,写出粗样,半通不通也没关系,传给我就行,我在你写的基础上再改。两人就这么一开头玩儿合作开了。

那是二〇〇六年,自此李硕儒便停留并居住在北京雍和宫附近,潜心历史剧的创作。李硕儒说:“俩人合作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泄气了,她那儿正鼓劲呢,她泄气了你再鼓劲。就这么不断进展,不断进展,大概弄了将近两年,居然写了四十二集。”

写历史剧,首先需要真实。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人民日报工作

李硕儒与《大风歌》

赵明



李硕儒

时,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人民日报曾专门展开过大讨论,吴晗跟李希凡就此问题打笔仗论证了一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什么叫历史真实?大的事件,主要人物,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状况,这些一定要真实;什么叫艺术真实?你完全按照那样的真实去写,有的就没戏,没法看;这就要求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再构思出好看的故事,形成戏剧效果”。难度也许就在这里,编剧要在吃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再编出符合历史符合那个朝代人物生活的生动故事来。

好在李硕儒各种文体都尝试过,年轻时他写过诗,后来写散文、随笔、评论、小说、剧本,无论哪一种,在他也称得上得心应手了。于是,在湖南女作家张伟佳遍查历史资料并粗写的草稿上,李硕儒拿起了自认为千钧重的笔。

此后近两年时间,他每日黎明即起,三餐简便随意,终日伏案,倾其所有智慧,将心血点滴渗透到两千多年前那个漫天大气象的征伐场面,又有细腻如潺潺溪水的爱情;既有上层文人唇枪舌剑的论争,又有黎民百姓朴实温厚的日常生活的汉代生活的剧本创作中。

在写作过程中,李硕儒很在意“诗情”在这部历史剧中的体现,他认为,“若历史剧没有诗情,那一定是干巴巴的,不好看。”李硕儒在这里说的“诗情”,我想应该是故事里弥漫的情调和所体现出来的文采。

李硕儒四岁时就爱看戏,他认为一定是受母亲的影响。他母亲没文化,但艺术感觉非常好,痴情戏剧,尤爱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每每看戏,母亲都会带上小小的李硕儒,李硕儒竟也能跟他妈妈一起,心潮起伏却表面安安静静地从始看到终。京剧的美文美韵伴随